

跟随利玛窦到中国

张西平 著



辽海传播出版社

ISBN 7-5085-0981-1



9 787508 509815 >

ISBN 7-5085-0981-1/K · 774

定价: 56.00 元



跟随利玛窦到中国

张西平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随利玛窦到中国 / 张西平著.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9

ISBN 7-5085-0981-1

I. 跟...

II. 张...

III. 中外关系—文化交流—传教士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1684 号

跟随利玛窦到中国

著 者: 张西平

责任编辑: 苏 谦

封面设计: 田 林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 6 号 邮编: 100038)

电 话: 8610-58891281

网 址: <http://www.cicc.org.cn>

承 印 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9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7-5085-0981-1/k·774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7 绪论 中西文化交流新一页

跨越欧亚大陆的对望 /7

寻找“契丹”的远航 /9

西儒利玛窦 /12

康乾盛世西洋风 /14

17 皇宫中的洋教士

万历皇帝的门客：利玛窦 /17

顺治皇帝的“玛法”：汤若望 /20

康熙皇帝的近臣：南怀仁 /25

大清的洋外交官 /30

37 明清之际的中国文人与传教士

利玛窦与《交友论》 /37

因求异而交往 /38

因信仰而交往 /44

65 西方天文历算传入中国

历法改革与天文学的传入 /65

制造测天仪器 /67

西方数学在中国 /70

73 从《山海輿地全图》到《中国新图》

利玛窦与《山海輿地全图》 /73

《皇輿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輿图》 /77

中国地图的西传 /81

85 穷理学：西洋学问之总汇

西方物理学与机械学的传入 /85

“红衣大炮”与明清历史的变革 /90

西洋自鸣钟与中国近代钟表制造业 /93

- 97 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
- 西乐萦绕紫禁城 / 97
 - 中国皇帝与西洋画 / 100
 - 中国早期的西式建筑 / 108
- 129 西方社会思想及文学的传入
- 传教士笔下的西方社会 / 129
 - 西方寓言文学的译介 / 133
 - 西方哲学、宗教在中国 / 135
 - 中国儒生眼中的基督教思想 / 137
- 139 明清之际基督教的发展与“礼仪之争”
- 基督教在华发展历程 / 139
 - “礼仪之争”及其后果 / 142
- 149 中国文化的西传
- 中国典籍的翻译和传播 / 149
 - “礼仪之争”与中国哲学的西传 / 152
 - 有关中国历史的报道 / 157
 - 欧洲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讨论 / 160
 - 耶稣会士与中国科技的西传 / 162
 - 传教士汉学的兴起 / 166
- 169 欧洲十八世纪的“中国热”
- 独具魅力的中国器物 / 169
 - 中国式园林建筑 / 171
 - 社会文化中的“中国时尚” / 174

绪论 中西文化交流新一页

跨越欧亚大陆的对望

中国和欧洲地处欧亚大陆的两端，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将中国和欧洲分开，北方的大漠千里黄沙漫无人烟，除了蒙古人的铁骑外，历史上很少有人越过。相隔就有眺望，眺望就有幻想，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欧洲和中国通过时断时续的联系，相互地遥望和幻想。

中国人最早向西行的，恐怕是东汉（25—220）的甘英，他大约到了地中海的东岸。走得最远的恐怕是列班扫马（？—1294），他到过英伦三岛，去过巴黎，最后在巴格达当上了主教，把他称为中国的马可·波罗实不为过。西方人最早来到中国的恐怕是柏朗嘉宾（Joannes de Carpino, 1182—1252），60岁的他作为教皇的特使，从西欧走到



柏朗嘉宾像

中亚，一路翻高山、越大漠，总算见到了蒙古大汗，可谓不虚此行。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中，最早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马可·波罗在中国真是风光一时，陪蒙古大汗喝酒、打猎，作为大汗的特使周游列国，据说还当过扬州的父母官。其实元代（1206—

1368)来中国的西方人还有很多,比如在北京当主教的孟德高维诺(Montecorvino, 1247—1328),在泉州当主教的安德烈(Andreas de Perugia, ? — 1332),但论影响,没有一个人超过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实在是太富饶了,香料堆积如山,黄金遍地都是,大汗的皇宫简直比天堂还要富足。不仅如此,“契丹人”还那么神奇,漫长的冬夜,他们用黑色的石头来烤火,而当时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煤可以作燃料,他们用纸张来换取任何物品,这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的欧洲还没有纸币。



孟德高维诺像

马可·波罗给欧洲人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东方,一个和欧洲教堂里那严肃的祈祷完全不同的快乐而富饶的东方。这个东方的神话,成为漫长的中世纪里欧洲人永远谈不完的话题,激起了一代又一代欧洲人的梦想。从此后,异域的“契丹”就成了欧洲人最向往的地方。



1477年德文版《马可·波罗游记》封面

寻找“契丹”的远航

寻找“契丹”，这是西方15世纪到16世纪整整一百年航海史的灵魂。

自幼喜欢航海的哥伦布（Columbus，1451—1506）是马可·波罗的崇拜者，这个意大利热亚那人决心要找到马可·波罗讲述过的“契丹”。当时的地理学家托斯卡内里（Toscanelli）也是一个马可·波罗的崇拜者，他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给哥伦布提供了向西航行的地图。“契丹”不仅吸引着哥伦布，当时的西班牙国王也渴望着遥远的财富，他决定资助哥伦布的航行。两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东方，西班牙国王为此还专门给了哥伦布一封致“契丹”大汗的书信。

1492年10月12日，经过30多天的航行，哥伦布的船队终于见到了陆地，这就是巴哈马群岛。在岛上他们见到了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的印第安人，男女老少都一丝不挂。哥伦布认为这可能是亚洲的边缘地区，他称之为“大印度地区”。10月28日，他们发现了古巴，哥伦布认为古巴一定是“契丹”最荒凉之地，而马可·波罗所说的香料堆积如山的“契丹”刺桐港（位于今福建省泉州市）一定会被他发现。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返回西班牙，244天的远航结束。哥伦布向人们宣布，他已经找到了“契丹”。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一时间哥伦布名扬天下。

葡萄牙地处欧洲的最西端，诗人们用“陆地到此结束，大海由此开始”来形容这个欧洲小国。当时在葡萄牙四周，南部的地中海是意大利人的传统商业势力范围，北海和波罗的海是汉萨同盟的商业势力范围，北部和东部是西班牙，西部是无边的大西洋。这样的地缘政治格局，使葡萄牙人只能向南挺进。于是，葡萄牙人驾着他们的三维帆船沿着西非海岸慢慢向前推进。在与摩尔人的斗争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中，葡萄牙的贵族们“把马匹换成船只，把盾牌盔甲换成罗经星盘，使

骑手变成了船长”。

1415年，葡萄牙占领了北非重镇休达（Ceuta），夺取了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并为以后对西非海岸的探险提供了一个活动据点。休达战役后，年轻的亨利王子（Infante D. Henrique, 1394—1460）被封为葡萄牙骑士团总团长。亨利开办了一所航海学校，聘请当时最知名的航海家和地理学家研制地图，并造出了灵活坚固的卡拉维尔轻帆船。由亨利主持航海探险，是整个葡萄牙航海事业的一个转折点，“他使探险和发现成为一门艺术和科学，使远航成为全国感兴趣的与之有密切利益联系的事业”。¹

欧洲的历史书说，北纬26度是个界限，如果跨过这一纬度，那里的海水会把人烫死，而且白人会被晒黑再也变不回白人。但亨利王子的探险队1436年驶过了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他们不但没被海水烫死，而且在非洲大陆登陆，第一次见到了黑人，这是历史上白人和黑人第一次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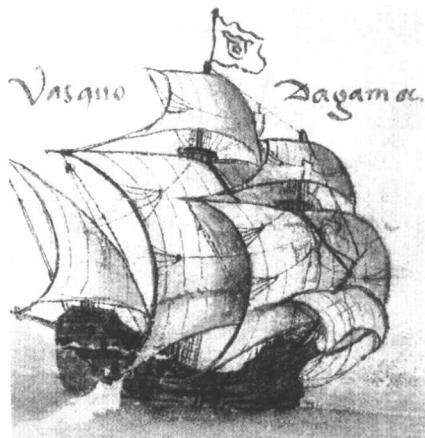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托罗缪·迪亚士（Bartolomeu Dias, 约1450—1500）发现好望角，是葡萄牙航海史上的又一重要事件。当时，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兴起，它中断了欧洲和亚洲的联系，亚洲的香料从此无法运到欧洲。而欧洲人吃牛肉时是必须要有香料的，不然整个生活都会索然无味。哪里有香料呢？马可·波罗说过，在“契丹”的刺桐港香料堆积如山。寻找到达亚洲的新路线，寻找刺桐港成为迪亚士的梦想。1489年，他率领船队绕过了非洲南部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离亚洲的距离更近了。

达·伽玛（Vasco da Gama, 1469—1524）无疑是葡萄牙历史



达·伽马像

上最伟大的航海家。1492年哥伦布率领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发现“西印度”（美洲）的壮举，对葡萄牙人刺激很大，“契丹”丰厚的财富绝不能让他们的手对手西班牙独占。当时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1469—1521）决定派达·伽玛率领船队远航。他们沿着东非海岸线航行，在到达



达·伽马首次远航印度时使用的帆船

赞比西河口时靠岸休整，当地的黑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还见到了两个头戴丝织帽的头领，这或许是郑和（1371—1433）留下的部属的后代，因为郑和离开这里不过70余年，而这里也正是郑和下西洋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洋东端的马六甲，这意味着葡萄牙在印度洋海上殖民帝国的轮廓勾勒完毕，也标志着其插手太平洋海上贸易的肇始。穿过马六甲海峡，广阔的太平洋就展现在葡萄牙人面前。

如果说西班牙人在北美发现的是土地，那么葡萄牙人在远东发现的则是文明，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一个比基督教文明更加悠久的文明。当葡萄牙人麦哲伦（Magellan Ferdinand, 1480—1521）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于16世纪20年代初完成环球航行时，当16世纪后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中国福建海域相逢时，一个“全球”的时代开始了。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在寻觅间邂逅相遇，从此开启了两百年东西文明交流、相融的伟大时代，一个欧洲和中国初恋般的美好时代。而这段深厚、美好的感情的奠基人，便是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说得好：“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

批欧洲人入华相比，因为他们既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²

西儒利玛窦

自葡萄牙人16世纪中叶以晒海货名义在澳门长期驻扎下来以后，澳门就逐渐成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汇点。由于葡萄牙在整个东方拥有“护教权”，打通中国，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从中获得丰厚的贸易利润，一直是葡萄牙人的梦想。

1517年，葡萄牙驻东印度总督委派皇家御医皮雷斯 (Tomé Pires) 访华，这是欧洲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1521年皮雷斯一行到达北京，但三个原因使这次访问未能完成使命：一是被葡萄牙灭亡的满刺加国的使臣到北京告发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海峡的劣迹，二是允许他们进京的明武宗（1506—1521在位）驾崩，三是当时的翻译火者亚三在北京声誉极差。结果火者亚三被处死，皮雷斯一行被打入死牢，最后生死不明，只留下他的同伴在狱中所写的几封信。



第一个来到东方的耶稣会士沙勿略在孤独中病逝于广东上川岛。

早期来到东方的西方人大都很不顺利。命运比皮雷斯稍好一些的是第一个来到东方的耶稣会士沙勿略 (S. Francisus Xaverius, 1506—1552)。他先在日本传教，当时日本人问他，你们的宗教中国人知道吗？沙勿略说不知道。日本人告诉他，如果中国人都不知道，你的宗教肯定不是好的。沙勿略由此才知道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地位，从而制订下

了在远东传教必须首先“归化”中国的方针。不久，他从日本来到澳门，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后来，他被一名中国渔民带到了广州附近一个叫上川岛的小岛上，岛上无一人居住。沙勿略高喊着：“岩石啊，你何时开门！”但中国的大门始终没向他敞开。在秋雨瑟瑟中，沙勿略病逝在上川岛上。

沙勿略失败了，却启发了他的后来者。1565年，耶稣会利用澳门在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在那里设立了澳门学院（College at Macao），负责管理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事务。这之后，耶稣会在远东传教的负责人范利安（Alexander Valignano, 1538—1606）定下了在中国传教一定要适应中国文化的“适应路线”。

第一个执行这一路线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 1543—1607）。罗明坚到澳门后，跟随一名中国文人学习中文。当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出现在广州每年对外国人开放的贸易会上时，马上引起了中国官员的注意。当地官员与他接触后，发现罗明坚温文尔雅，对中国文化也比较熟悉，这让官员们非常高兴。经过两年的交往，罗明坚被允许在当时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长期住下来。1583年，罗明坚来到肇庆，并在肇庆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当地官员王泮为其命名“仙华寺”。不久，罗明坚把自己的老乡，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也调到了肇庆。

罗明坚为传教四处周游，他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如果中国皇帝不认可基督教，那是不可能有大发展的。如何做好中国皇帝的工作呢？那只有梵蒂冈的教皇亲自出面，给中国皇帝写信，送份厚礼，传教士们才可能见到中国皇帝，并在赢得皇帝的好感后，提出他们的传教计划。为此，罗明坚返回了欧洲。哪知欧洲局势风云变幻，梵蒂冈四易教皇，罗明坚的设想一直被教廷置于脑后。最后，罗明坚老死于故乡拿波里。

罗明坚离开后，利玛窦在中国独力支撑。利玛窦做了两件大事，从此打开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局面。第一，修正过去以“西僧”出现的

面貌,改为“合儒易佛”。利玛窦脱去袈裟,换上儒袍,出门开始坐轿,并像中国的儒生一样,读“四书”、念《诗经》,出入于文人墨客之中。第二,进驻北京,接近明皇室。1601年,利玛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到北京,靠着进呈给万历皇帝(1573—1619在位)的自鸣钟在北京住了下来,并成了万历皇帝的门客。虽然他从来没见过皇帝,也从未参与朝中之事,但在文人中颇有影响。不仅有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这样的晚明重臣投于他的门下,就连李贽(1527—1602)这样的另类文人也很欣赏他的才华,处处给他以帮助。

1610年,利玛窦病逝,葬于当时北京城西的栅栏墓地。基督教从此在中国真正扎下了根。

康乾盛世西洋风

1644年,明朝灭亡。接替它统治的清王朝入关后,中国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变化中。此时的耶稣会士广泛活跃在各种政治势力之中。在北京,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

南明王太后受洗图



1666)成为清顺治皇帝(1644—1661在位)的“玛法”,一时权倾朝野。在南方,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 1582—1649)、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等传教士紧随南明王朝(清入关后,明皇室残余势力转往南方,在南京称帝,历时17年,史称南明),乃至南明永历皇帝的母亲、皇后、皇妃、太子都受洗加入了天主教。在四川,耶稣会士利类思(Louis Bagkio, 1606—1682)、安文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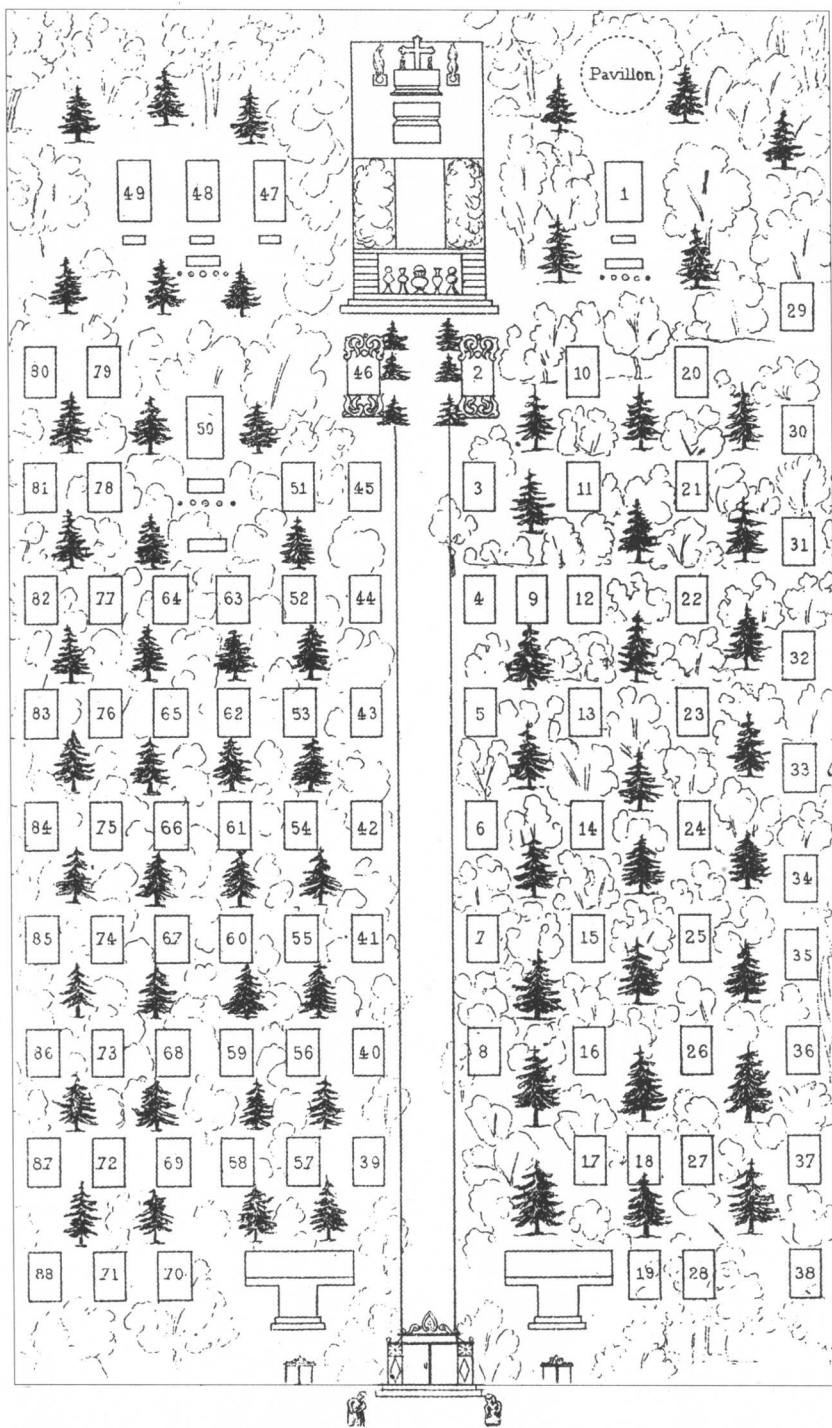
(Gabriel de Magalhaens, 1609—1660) 成为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 (1606—1647) 的“天师”。

清一统江山后,不久即发生了西洋历法和已经在中国使用多年的回回历、大统历之间的争持。正是这场“历法之争”,引起了年幼的康熙皇帝(1662—1722在位)对西洋科学的兴趣。从此,康熙演数学、学医学、绘地图、测天文,他在位的六十余年里,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其后的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继承康熙遗风,对西洋传教士一直十分赏识,宫中西洋风势头不减,西方文化以多种形式传播开来。

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传教士这一站在文化交流双轨线上的群体,成为中国和欧洲早期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和桥梁。正是通过他们,中国和欧洲才在精神层面上相识: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促成了明末清初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变化;同时,中国文化传入欧洲,催生了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

如果和1840年以后的中西文化关系相比,此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处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虽然双方都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理解对方、吸取对方,但从总体来说,那是两种文化间没有仇视和欺诈,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只有相互仰慕、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时代。分歧是有的,冲突也不乏激烈,但一切都集中在对文化的理解上。中国近代学者胡适(1891—1962)认为,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文化间一见钟情的典范。这的确是一个精辟的概括。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和欧洲之间相处最平稳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理解最为深远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中西关系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栅栏墓地示意图。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安葬于此，后来它逐渐成为来华传教士的公共墓地。

皇宫中的洋教士

到北京去，走进皇宫，接近中国的皇帝，这始终是来华传教士的梦想。罗明坚为此回到欧洲，想以教皇特使的名义进京；利玛窦故意将自鸣钟的运转机关握在手中，不告诉明朝的宦官们，也是想借此获得晋见万历皇帝的机会。这个梦想从汤若望开始实现了。到康熙皇帝时，欧洲传教士在清朝皇宫中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在大清帝王的身边，开始有了一批洋教士，他们或出入宫廷，作为清帝的科学顾问，或游走四海，作为帝国的外交家。他们制造西洋器械，编制天文历法，修建圆明园西洋楼，挥笔描绘清帝辉煌战绩……宫中转教士成为清朝中前期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万历皇帝的门客：利玛窦

利玛窦，这位意大利马切拉塔城（Macerata）的名门之后，1583年和罗明坚一起来到肇庆，是最早长期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之一。1588年罗明坚返回罗马后，利玛窦就成了耶稣会在中国的领航人。当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朋友瞿太素的劝告下脱下僧袍，换上儒装、戴上儒冠时，他“合儒易佛”的传教路线已基本确定，同时，向北京进军也成为他在中国的战略目标。

进入北京

利玛窦曾有过三次进京计划。1595年，利玛窦在广东韶州（今广